



边看边聊

旅行爱好者到过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肯定不少，但不知有多少人拜访过藏于林木浓密小山上的鲜黄色大房子——作家史蒂芬·茨威格的故居。

萨尔茨堡本是莫扎特的故乡，茨威格则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有犹太家庭。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是理想、自由、文化、艺术茁壮成长的沃土，维也纳更是举城热爱文化艺术的优雅之都，荟聚了几世纪的精华。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说，选择萨尔茨堡定居，是因他的工作需要深居简出，而在奥地利所有小城中，萨尔茨堡不仅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也极为理想，它位于奥地利边陲，是通向全欧洲的出发点。

茨威格买下房子的1916年萨尔茨堡仍是个古朴浪漫小城，阿尔卑斯山脉的峻岭在这里和德国

住在胭脂巷里面的居民，像是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家家都有故事，楼道里透着浓浓的烟火气。

二楼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八十多岁的孤寡老人，社区里的人经常会过来送东西。她的家门口拉着一道铁栅门，看见有人经过，她或央人给她丢垃圾，或差人给她去买面条水饺，总是隔着铁闸门说很饿。三楼住着一个中年男人和他的母亲。房门常年不关，尤其夏天。男人不工作，对母亲特别孝顺。常看见他把母亲安置在轮椅上，两人每天热烈而大声讨论吃什么：红烧甲鱼、油豆腐炖肉、萝卜丝烧带鱼、鲫鱼豆腐汤等等。经常会煎咸带鱼，整个楼道里都飘散着一股咸香，闻起来就觉得特别下饭。

那个挺有名气的电视台主持人阿宝住的是五楼，头发梳得锃亮，衣服笔挺，常在节目里看见他。四十多岁样子，电视节目光鲜的那几年，经常半夜喝得醉醺醺被送回来，送他回来的都是豪车，拥簇着珠光宝气的中年女人。看管传达室的阿明穿的衣服很奇怪，有的时候穿的像建筑工人，有的时候突然会穿阿玛尼、鳄鱼等名牌，这些衣服都是阿宝不要穿了送他的。冷不丁，阿明穿个白裤子坐在传达室，乍一看背影以为阿宝在做节目。

四楼的房子经常出租，早几年租客是两个俄罗斯美女，在金海岸跳舞，身材火辣得不行，大冬天也穿个短裙，晃悠着两条大长腿。后来金海岸搬迁转型了，租客换了杂志社的两个妹子。现在是两个毕业没多久、刚到杭州来加盟互联网行业的小伙子。

我对门六楼的老太十年前死了老伴，那年冬天，我和朋友喝了酒，摇摇晃晃回到家里，洗了澡倒头就睡。第二天正是大雪缤纷，窗外银装素裹。我打开房门准备上班，结果眼见走廊上楼道里全部是耀眼的白色。我以为走廊上怎么也下雪了，定睛一看是一溜排花圈，对门的电工老头生病走了。他给我装过电灯，我去送了个白包（杭州人的风俗习惯，人没了去送礼要用白色信封，送的礼金不能是双数，要单数。）我恭恭敬敬给老伯上了香。

老太有个女儿，读书成绩很好，就是和老太处得一般，老头没了之后，女儿结婚了很少回来看她母亲。老太退休金不高，但穿着打扮还是讲究，经常在楼下小区里穿个紫色或红色的金绒旗袍，叼个烟，头发烫得蓬松，焗了黄色，涂个口红，那么跷腿深沉地坐在那里，还颇有老年市井版的花样年华韵味。

小区的传达室就像一个联合国新闻联播，从早到晚，总是集聚了一波年纪大的大伯大妈，今天哪个菜场什么时鲜菜上市了，价格多少，怎么烧法；明天哪个企业上市或倒闭了，后天哪个国家领导人出访。中东局势态势，美国又使什么幺蛾子。国家无小事，小家也大事，话题常年不断。只要我上午出门晚了，几个人看见我就说：“小邱，你今早接个噶暗滴（你今天怎么这么晚的），迟到了哦，你们单位，同喔们（我们）社区是结对子滴，你们淘汰下来的电脑，有资助喔们（我们）社区支部的。”

他们一边说我，我一边点头称是，小区里大家养的那只小黑，也在旁边摇着尾巴看着我，眼神和大家一样，笑眯眯的。

胭脂巷就像日剧里的《深夜食堂》，这些老居民们，就是每天烧着这些热腾腾菜肴的大厨或小厨。就像老农喜欢田间地头的庄稼瓜果一样，我用鼻子就知道哪家今天烧鱼和肉，闭眼就能丈量巷子里的各式店铺，这些店铺从南到北，各怀风情。正如孙楠所唱的：“风往北吹，看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

平原相连。“我买的那栋房子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上，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历史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当你从山岗的平台上鸟瞰山下塔尖林立的城市屋顶和山墙门窗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向上的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

这是余一座结构奇巧的古建筑，门脸宽大华丽壮观但纵深很浅，厅室不过九间。它是17世纪一个大主教狩猎时的行辕，1870年弗兰茨皇帝访问萨尔茨堡时曾在长廊上嬉戏。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茨威格从苏黎世回到萨尔茨堡，直到1934年离开去伦敦，除了外出旅行，都和首任妻子居住于此。

作为20世纪享有最多读者，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惨遭纳粹迫害的犹太

德语作家，茨威格一生未获任何文学奖项，却被视为最好的传记作家和中篇小说作家。这位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所称的“世界一流作家”，很多杰作在这栋居所诞生，比如1920年创作的《三大师》，1922年出版的《链条小说》的第一

二本小说

集《热带癫痫症患者》，收录了《热带癫痫症患者》（也译《马来狂人》）、《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我和朋友们偏爱的《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作家自己也很钟意，他说这两部中篇小说深受读者欢迎，“达到了平常只有长篇小说才会有的程度。”

一战后的1924到1933年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日子，尤其后面几年，小城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夏天它不仅是欧洲艺术家聚会的地方，也是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而茨威格的家也成了一个中心。

“我们那座在卡普齐纳山上的房子成了我欧洲朋友的落脚处，有谁没有到我们那里做过客呢？”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在此住过，晚餐桌上的客人是一串眼花缭乱的名字。“每到夏季，这些人给我们带来多少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

随着1933年希特勒上台，针对犹太人的骇人暴行开始酝酿，有天秘密警察突然上门搜查，风雨



欲来，纳粹侵占奥地利前夕茨威格决定离开。

1942年2月22日，在异乡的另一栋房子——巴西彼得罗波利斯的小别墅里，刚满60岁的茨威格和33岁的第二任妻子夏洛特吞服苯巴比妥相拥自杀。他的遗书说，“在我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在我精神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

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在生前最后的著作《昨日的世界》结尾，茨威格这样写道：“阳光普照着大地，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自己眼前的影子，我于是也看見这场战争背后上一场战争的影子。但是，任何阴影，到头来也只是光线的孩子，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亡，才算是真正活过。”

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一个秋天，我送掉了厚棉衣、棉裤和大头皮鞋，装满了几纸箱文学名著，从济南空军部队复员了。复员后3个月，稀里糊涂地考上了电视大学。电大虽然不是全日制本科，也不住校，每周只有三个半天脱产读书，但教学的老师都是北大的名教授，那时大多是坐在教室里收听广播，或者在家收看12英寸

前有杰克·克鲁亚克提出的“垮掉的一代”，后有日本社会大加批判的“宽松世代”，在我们口中则将青年们各自丢进“80后”“90后”“00后”的分拣筐里，大有一番五年一隔阂，十年一割席的气势。那么在撒腿狂奔的时代面前，年轻人是如何谈论“独立”的？

自一月末以来，不少人目睹了疫情面前的年轻人二话不说扛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大量涌现在一线岗位上辛勤奋战，这颇有关的一面似乎也向所有人证明了曾背负大量争议的一代人如今正以自己的方式扎实地站立在这片土地上。然而，一旦脱离这类宏大的公共议题，他们作为每一个不同的普通人，却在生活中不断面对相同的灵魂拷问：工作得怎么样？对象找得怎么样？存款有多少啦？好像有一个答不上来，就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人。“80后”作为过来人，对此捧腹大笑，称如今总算让“90后”也体会到这一天了；“90后”则咬牙切齿，一边将视线投向“00后”，暗自对这三个问题心虚不已。那么当我们在谈论独立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一说我们该谈经济独立。有人将其细分成三六九种，从“口红独立”到“车厘子独立”，把生活中那些人们盼望的小奢侈尽数囊括其中。这可引来不少年轻人连连叹息，叫苦不迭，大叹一句“我不配”，嘲讽起自己来的那股狠劲可毫不手软，可见在经济独立这第一座高山面前有多少人折戟沉沙，只得被迫自愿“佛

系”度日。二说我们该谈人格独立。年轻人愈发警惕大家长制潜移默化的影响，个个开始学会替自我发声，无论是试着理性分析原生家庭，学着适应周遭环境，敢于与他人产生冲突，解决冲突，还是塑造起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与评估标准，都是在有意识地认识并挖掘自我，向内生长。三说我们该谈思想独立。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信息以几何级数爆炸式增长，我们该如何不被卷入社交媒体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旋涡，被个体情绪、真假难辨的消息、消费主义所挟持而失去自主判断力，落入人云亦云的境地，着实也是谈论独立时不得不面对的一关。

如今第一批“90后”已面对而立之年，“00后”也紧接着即将迈入职场，人人自觉周身危机四伏，在同辈压力和后辈浪潮下喘不过气来。“别人家的孩子”从十岁到三十岁永远是座无法跨越的高峰，于是他们把手里保温杯备好，买好枸杞泡腾片和防脱洗发液，好似中年危机早就要到来，惹得真正的中年人们纷纷摇头。而所谓的“独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与许许多多标签和外在准则捆绑在一起，你越是渴望它，越是发现它似乎并不靠你宣称，而是一枚靠他人替你颁发的奖章。但我们想要寻求的独立，难道不是一个内在的自治与外在的平衡吗？独立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

黑白电视机。我那时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工作之余读书，更是苦不堪言，但苦中有乐。电大对我今后的人生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以后又读了N次班，甚至是华师大中文系古代汉语研究生班，但有了电大这碗老白干垫底，再遇到什么酒，都是小菜一碟。

电大不仅是掌握知识的摇篮，亦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平台。因我酷爱文学，读书之余，涂鸦些诗歌和散文，抱着期盼的心理，将稚嫩的作品寄给了《上海电大报》副刊编辑江小燕，未料拙作竟然在该报发表了，文字经过修改润色，精练许多，生色不少。见到处女作变成铅字时，虽然是内部小报，但当时那个兴奋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仿佛不远的将来自己成为一名作家。从此，我对文学的兴趣大增，且一发而不可收。诗歌、散文在电大报上频频发表，对我今后走上文学之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发稿编辑江小燕写有一手漂亮的字，她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帮

我修改发表了许多稚嫩的拙作，我几次给她打电话，提出想去电大报拜访她，当面道谢，并送点礼品略表寸心，但她都婉言谢绝了。暑假期间，我曾收到过一封江小燕的来信，信封地址是虹桥路，我曾想去拜访她，但那时没有电话，不打招呼冒然上门，感到不妥，最后还是放弃了。

后来我看到叶永烈写的文章，说“文革”中有位叫江小燕的女士冒领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的骨灰，悄悄地保存了起来，被工宣队发现后关押了起来，通过多次审讯，没有查出背后的指使者，等待分配的女学生只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总算化险为夷，又放了出来，但影响了自己前途，最终在一家街道小厂打工。

我反复琢磨叶永烈的文字，想从中找出蛛丝马迹，但他没有提到这位侠骨女士的单位，此江小燕是不是彼江小燕？名字重

## 七夕会

复的很多，我一时无法确认。傅雷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家，他翻译的四卷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我爱不释手，尤其是他翻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巴尔扎克系列作品，文字隽永，韵味独特，我读得如痴如醉。

直到新世纪，我参加杂志主编培训班时，遇到了《电视大学报》的编辑江小燕吗？”

他说：“当然认识，她已调至上海大学教美术。”我追问：“她是否就是冒领傅雷夫妇骨灰的那个女士？”陈东语气肯定地说：“就是她！”

虽然我曾经怀疑是她，但真正确认是她后，还是惊讶不已。没想到我会遇上这么一位不同寻常的好人，她热情帮我发表作品，却又拒绝上门致谢，这与她冒险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不求回报的侠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我至今还遗憾未能见她一面，但我永远记住了江小燕老师。

黄崖关长城（写生） 赵建平



上海七宝镇老街上有一段，全是油炸臭豆腐的小店，行走其间，那味道直往鼻孔里钻。小店的臭豆腐味道是正宗的，辣火酱也是“老早的味道”。那里总是人山人海，人们拿着一串串油炸臭豆腐满街转悠，一些老外也来凑热闹。不知道他们吃了上海的臭豆腐作何感想，对舌尖上的中国是否加深了认识。

北京的臭豆腐和上海的大不一样。近年，北京的庙会上，偶尔见到南方传过去的油炸臭豆腐，但是，北京人的臭豆腐却是另一种。那种臭豆腐一寸大小的方块，厚度半寸不到，深灰色，不是炸了吃，更用不着沾辣酱。它本来就做熟的，齁咸，初到北

京者，不敢贸然领教。

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和六必居的酱菜一样，偶尔出现在人们早餐的餐桌上。中饭和晚饭不会有，它在市民的食谱上属于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有时它也会救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夏天多雨而湿润，经常是夜里狂风暴雨，早晨却是艳阳高照。有时天公不作美，程序颠倒过来：夜里静悄悄，黎明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有时要下整整一天。

天气好的时候，胡同里每天有卖蔬菜的车子推来，菜贩扯着嗓子吆喝：“黄瓜萝卜弯豆角儿，芹菜小白菜老窝瓜！”四合院里

的主妇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各种蔬菜。但是，遇上连阴雨天，菜车不出来，这时，卖臭豆腐的小贩就该出场了。

又过了几年，遇到雨天，胡同里再也听不见臭豆腐的叫卖声了。走街串巷卖臭豆腐的少年

们，消失在故都改造的进程中。人们偶然想到臭豆腐，只好去酱园里买。

在北京，经营臭豆腐的有两家名店，一家叫致和，一家叫王致和。公认的说法是致和的臭豆腐好，王致和的酱豆腐好。酱豆腐其实就是上海的豆腐乳。据说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也很有名。卖长沙臭豆腐的店家，居然把小店开到苏州的闹市区

观前街上。店家吆喝道，长沙的臭豆腐哇，不吃长沙的臭豆腐算不得去过长沙啊！卖长沙臭豆腐的还是有相当底气的。

曾经与朋友谈及唐朝闻先生关于艺术的“不到顶点”一说。创作不必面面俱到，留些余地，留些空白，有显，有隐，更能耐人寻味。处处着墨，所有细节用力太过，易流于匠气。

臭豆腐是表里不一的食物。食品讲究色、香、味、形，而北京的臭豆腐几乎都不具备。看上去不甚雅观的食物，但喜欢的人奉为美味。

在“颜值”大行其道的今天。难道，食品也讲究颜值？

## 美味臭豆腐

东进生

## 美食